

展柜中,红烧土块被精心拼接,彩陶残片、石器模型与遗址三维复原图相互映衬;一旁循环播放的联合考古影像资料,完整记录着两国学者在同一处遗址的发掘历程……在位于罗马尼亚雅西市的雅西摩尔多瓦国立博物馆,中罗多布若瓦茨联合考古项目阶段性成果展不久前落下帷幕。展览期间,馆内人流如织,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来了解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与中国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见证黄河之畔与黑海之滨跨越千年的文明共鸣。中罗双方以考古为纽带,在史前聚落与彩陶文化的联合研究中持续深化学术认知,也为当代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写下生动的实践注脚。

## “罗中两国学者平等交流、携手研究的珍贵见证”

“联合考古成果丰硕,我们合作非常愉快。”罗马尼亚科学院雅西考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内莉亚-玛格达·拉扎罗维奇对记者说,“成果展上的展品不仅呈现了5000年前史前聚落的生活图景,更成为罗中两国学者平等交流、携手研究的珍贵见证。”

“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踏上欧洲大陆,在欧洲史前文化的发祥地东南欧展开考古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温成浩介绍,2019年7月,中罗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启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罗马尼亚科学院雅西考古所、雅西摩尔多瓦国立博物馆等单位的10余名科研人员组建联合考古队,在罗马尼亚雅西市多布若瓦茨村开展发掘工作。

这次跨国合作缘起于2017年的一场学术交流。当时,拉扎罗维奇同罗马尼亚学者拉克勒克拉米奥拉·斯特拉图拉特等人来华推介库库特尼文化。访华期间,他们走进了河南仰韶文化博物馆、甘肃马家窑遗址。当展柜中精美的彩陶映入眼帘,几位学者难掩吃惊与好奇,忍不住将其与库库特尼彩陶展开对比:“中国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与库库特尼文化实在太相似了。”

这种相似并非偶然,相关探讨已延续百年:1921年仰韶村遗址发现后,瑞典学者安特生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德国学者胡伯特·施密特则提出异议,认为仅凭纹饰相似无法推断文化同源。随着中国考古学发展,“彩陶西来说”已被否定,但两大史前文化的相似性仍值得深入探究。就这样,中罗学者达成共识,决定走进彼此的考古遗址,用充分的田野考古证据,让两大史前文化的比较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

## “中国同行不仅带来了先进设备,更带来了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属于库库特尼文化体系的多布若瓦茨遗址,地处罗马尼亚东北部丘陵地带,是东南欧铜石并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此次联合考古的工作重点,聚焦于聚落形态和红烧土房屋遗迹的系统发掘与研究。

在遗址西部边缘区域,联合考古队共清理出9座红烧土房屋遗迹,其中编号为3号的房屋体量最大,房屋中央还发现了祭坛遗迹,而祭坛一角出土的一件保存状况较好的陶器,成为双方合作中的重要发现。

中欧联合考古,让尘封的史前文明跨越山海对话

# 黄河之畔与黑海之滨的文明共鸣

本报记者 禹丽敏

“清理时大家都非常谨慎,尽量保持其完整状态。”温成浩回忆。罗马尼亚考古工作人员米尔恰·奥安卡还记得,为了这件陶器的顺利出土,罗方人员负责具体操作,中方人员在旁协作指导,耗时整整3天。“当陶器最终完整出土时,我们都激动坏了,也在并肩合作中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奥安卡说。

两国学者的交流与互鉴贯穿在日复一日的田野工作中。中方团队将无人机、全站仪等现代化考古技术手段引入联合发掘,为研究工作注入新的活力;无人机定期对遗址进行航拍,让研究人员得以从整体视角观察遗址布局;洛阳铲在验证地磁勘探结果、寻找隐蔽遗迹方面发挥独特作用;红烧土板块拼合完成后,中方团队搭建的三维模型,为后续研究和资料整理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数字化记录方法大大提高了资料整理效率,也为今后的研究留下了可靠的数据基础。中国同行不仅带来了先进设备,更带来了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拉扎罗维奇说,这种技术与理念的结合,让双方的合作更加顺畅、更加富有成效。

罗马尼亚同行则在红烧土房屋研究领域拥有丰富经验。他们将倒塌后的红烧土块视作与陶片同等重要的信息单元,通过逐块编号、精准测量、立体建模的方式,借助红烧土背面保留的木质结构印痕,还原史前房屋的建造方式与使用形态。温成浩说:“罗方的研究方法为中方团队带来了新的启发。”

“即使语言不同,我们在田野里也能形成默契。”拉扎罗维奇表示。

“只有把中华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坐标中去看,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独特之处”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多布若瓦茨联合考古项目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愈发凸显。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作为中国考古学首次系统性走进欧洲史前文明重要区域的田野工作,该项目让中国学者得以通过对库库特尼文化的深入研究,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重新审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史前社会的发展路径。

拉扎罗维奇表示,库库特尼文化与仰韶文化大体处于相近的历史发展阶段,均以农耕经济为根基,制陶工艺高度发达,社会分化程度相对有限,同时普遍使用陶器、建造木结构房屋,并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红烧土房屋倒塌堆积,这些共性让两大史前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彩陶纹样中那些相似的弧线、三角形组合,很容易引起联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伟表示,两大文化的比较研究,关键在于共性的同时看到差异,进而深入理解不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自主选择。这正是史前文明研究的核心意义所在。

这场跨国考古合作,不仅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更留下了诸多温暖的跨国情谊。考古队员们租住在多布若瓦茨当地村庄,与村民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当地村民常常热情地将新鲜的水果、香醇的牛奶等送到考古工地。“他们直接把东西塞到我们手里,那种善意非常真诚。”温成浩说。

(下转第四版)

击网赌电诈、禁毒、追逃追赃等领域健全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并在“平安城市”建设、科技强警等方面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提升执法能力水平,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切实维护安全稳定。

董军表示,面对前所未有的外部安全风险挑战,中越两军作为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捍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方面重任在肩,必须在两党最高领导人指引下,携手筑牢防务安全屏障。中方愿与越方一道,持续增进军事安全互信,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质效,以良性互动共同守护海上安全稳定,推动两国国防领域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树立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团结自强的典范。

越方表示,当前国际地区局势变化迅速且更趋复杂,两党两国加强团结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尤为紧迫。越方始终将巩固和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予以坚定支持,愿同中方携手并进,筹备好高层交往,推进各领域合作,密切双边协调配合,共同将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层次。

双方一致表示,“3+3”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越战略沟通协作建立起新平台,迈上了新台阶,提升到新水平。

双方一致认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给中越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共同挑战。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强化战略定力,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提升战略韧性,发挥制度优势,深化互利合作;加强战略协同,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双方一致同意,将在中国举办“3+3”战略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同时充分发挥机制高官的日常联络作用,深化外交、国防、公安对口交流。

会议期间还将举行两国公安部第九次合作打击犯罪部长级会议和第十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

和战略选择,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王毅首先转达习近平总对苏林的亲切问候,再次祝贺越共十四大胜利召开。王毅表示,此次赴越出席“3+3”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就是要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我们围绕“统筹发展与安全,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这一主题深入开展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对外释放中越两大社会主义国家携手维护政治制度安全、共谋民族发展振兴的重要信号。这是中越两国在全球首创的战略沟通平台,标志着双方战略互信与合作迈上新台阶,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取得新进展。

王小洪、董军分别介绍中越公安、国防部门间合作情况。访问期间,越南总理范明政会见王毅一行。王毅还与越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黎怀忠举行了双边会谈。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16日在京会见加拿大议会加中议会协会共同主席吉尼亚克参议员和罗耶众议员一行。双方就两国关系、立法机构交往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3月16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土库曼斯坦民族领袖、人民委员会主席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将于3月17日至19日来华进行友好访问。

# 中美在法国巴黎举行经贸磋商

本报巴黎3月16日电 (记者翊翔、韩硕、尚凯元)当地时间3月15日—16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围绕关税安排、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维护已有磋商共识等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并将继续保持磋商。

何立峰表示,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战略引领下,经过去年五轮经贸磋商,中美在经贸领域达成一系列磋商成果,为两国经贸关系和世界经济注入了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近期,美最高法院已裁决美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的关税违法,随后美方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

##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是现实威胁,必须遏制其成势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予以更大警惕,遏制其成势蔓延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再次表达强烈修宪意愿,并提出从根本上强化日本防卫力量、扩大杀伤性武器出口、提升国家情报能力,传递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明确信号。日本国内有评论尖锐指出,2026年可能成为“日本军事化转型元年”,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强化防卫力量上,更渗透到产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社会各领域,意图使整个国家全面染上军事色彩。

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它披着“和平”和“防卫”的外衣,核心目标却是摆脱二战战败国束缚,推动日本成为能够对外行使武力甚至发动战争的军事大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这一进程全面加速,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及意识形态等领域,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与战后国际秩序束缚,重整军备的步子越迈越大、越迈越急。

事实充分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予以更大警惕,遏制其成势蔓延。

(一)畸变:“新型军国主义”既保留了传统军国主义的扩张基因,又异化出极具欺骗性的新特征

黑龙江佳木斯市烈士陵园里,长眠着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抗日战争期间,她目睹日军侵略导致中国平民伤亡的惨状,坚定投身抗日运动,用日语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广播”。“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在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在为谁卖命?又是在为谁效忠?圣战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壁的这里……”

绿川英子的疾呼,矛头直指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对内实施思想控制与军事统治,对外推行侵略扩张。从二战结束直到今天,军国主义的幽灵仍在日本上空游荡。日本当前的“新型军国主义”是军国主义在当代的顽固孪生与畸变演进,既保留了扩张基因,又异化出极具欺骗性的新特征。

政治上,近代日本几乎未经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由财阀与政府、军部通过利益捆绑、家族姻亲等方式结成的封建性“门阀”统治集团。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外衣下,战后日本的统治集团依然主要由政治世家、职业官僚与财阀巨头构成,其家族多可追溯至战前统治阶层。在这一新生态中,激进政客和职业官僚填补了昔日军部的“生态位”,行政力量与财阀利益深度绑定,在民主程序的掩护下执行军事扩张意志,推行“新型军国主义”。

军事上,因缺乏原始积累和资源,昔日日本军国主义极度依赖对外战争和殖民掠夺来补充资本,采取“以小博大”的军事冒险主义。“新型军国主义”同样将备战作为核心议程,重点打造进攻性力量。但受限于“和平宪法”与日本社会和乎力量,其手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不再直接宣扬侵略,而是通过“切香肠”的方式,以“发展反击能力”掩饰进攻意图,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用兵,以强化“经济安全”“危机管理”之名行战争动员之实,试图在“合规”的假象下实现军事扩张。

经济上,昔日日本军国主义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压榨民众以支撑重工业和军工生产,财阀既是扩张的基础,也是动力,形成恶性循环。“新型军国主义”同样建立了重整军备与财阀利益的共生关系。日本政府通过超发国债和增税获取财政收入,将之以巨额军费采购形式输送给财阀,完成了财富从普通国民向军工利益集团的转移。这种巨额军工投资一旦形成路径依赖,政府若不能维持、扩大军备采购,财阀利润便难以维系,势必采取一切方式倒逼国家政策进一步军事化。

文化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承袭了战前“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武士道”等文化糟粕,奉行实力主义与军事扩张的狭隘逻辑,视邻国发展为战略威胁,与军国主义鼓吹的“主权线”“利益线”扩张理论如出一辙。“新型军国主义”文化在内容上,增加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作为包装,以蒙蔽国际社会;在手段上,注重利用社交媒体时代的算法推荐与舆论操控,构建“信息茧房”,潜移默化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久前,知名游戏动漫IP宝可梦计划在靖国神社举办相关活动,引发轩然大波。这再次表明,“新型军国主义”思想所宣扬的扭曲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正通过文体娱乐等隐蔽渠道向年轻一代深度渗透。

外交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延续了重投机、挑对抗的地缘博弈逻辑,以种种操弄搅浑水,企图借战略扩张制造便利。近年来,日本右翼持续推动深化日美同盟,甘当所谓“印太战略”的马前卒;加大对地区热点问题介入,拉拢个别地区国家深化防务合作,以双边军事合作加快军事解缚步伐;加大域内外联动,推动“北约东进”,打着“积极和平主义”幌子深度介入全球安全议题,寻求自卫队全球行动。

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消,日新发酵。绿川英子当年“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的疾呼,穿越时空,至今仍振聋发聩。

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进口附加费,还陆续出台了有关301调查、企业制裁、市场准入限制等涉华消极举措。中方反对美方加征单边关税的立场是一贯的,敦促美方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美方表示,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非常重要,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供应链安全和金融稳定。双方应减少摩擦、避免问题升级,通过磋商解决分歧。

双方同意,研究建立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的合作机制,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

## (二)塑形:军国主义思想潜滋暗长、激进政治力量主导、社会经济焦虑畸变、利益集团推波助澜综合作用的结果

“时至今日,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的所谓‘屈辱’仍顽固盘桓在日本右翼的心头,由此滋生的‘复仇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他们想要让日本社会再度彻底笼罩在军国主义的阴影之下。”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上世纪80年代曾在日本工作,切身感受到日本右翼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猖獗。他回忆道,日本右翼分子经常在人流密集的广场等公共场所举行大型集会,甚至试图拉拢中小學生并向其分发传单和宣传册。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渐成形,是军国主义思想潜滋暗长、激进政治力量主导、社会经济焦虑畸变、利益集团推波助澜综合作用的结果。

——日本军国主义没有被彻底清算。与德国战后彻底的“去纳粹化”不同,日本战后的民主化改造在美国冷战战略影响下半途而废,军国主义遗毒被保留在了日本的政治肌体之中。

二战后,美国出于冷战考量,对日政策迅速从“压制”转向“扶植”,导致包括岸信介在内的海量甲级战犯嫌疑人未受审判便重返政坛,甚至占据了首相相等权力中枢。这些旧时代的“亡灵”及其后继者,构建了战后日本长期执政的保守政治谱系,使得军国主义思想在权力核心得以保留。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颯藤厚所言,战后日本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人确立的,其影响延续至今。

历史清算不彻底导致日本历史认知存在严重扭曲。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将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战争”,将战败仅仅视为“终战”。在所谓“耻感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右翼将战败视为需要洗刷的耻辱,而非需要反省的罪责。日本右翼公然鼓噪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本质上是这种错误史观的外化,试图翻案历史定论、否定战后国际秩序,为再次武力扩张寻找法理借口。

——日本政治右倾化愈演愈烈。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政治生态推波助澜综合作用的结果。曾经作为制衡力量的革新派与温和保守派日渐式微,右翼保守势力不仅完成了对政坛主流的清洗与整合,更占据了国家权力的绝对中枢,不断将极右翼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国家的制度意志与法律行动。

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掏空日本战后长期奉行的“重经济、轻军备”路线,传统的“和平主义”被污名化为“和平痴呆”,而激进的“修宪强军”则被包装成“国家正常化”的必由之路。这种政治路线日渐固化,激进的安保政策在国会几乎遭遇不到实质性阻力,在缺乏有效制约的真空中狂飙突进。

——经济长期低迷让日本陷入战略焦虑。日本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日益陷入复杂困境。在巨额国债负担、产业空心化加剧以及少子老龄化危机的多重影响下,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停滞泥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已从世界前列跌落至发达国家的中下游水平。作为立国之本的制造业光环亦日渐黯淡,其工业产值在过去30年间下降了约40%。日本中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陡增,社会弥漫着深重的无力感与挫败感。

竞争优势渐失、人口结构老化、增长势头衰减,催生了扭曲的战略观。为了掩盖内部治理失灵,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成了日本右翼政客转移国内矛盾的救命稻草。他们将物价上涨、产业衰退等民生痛点简单粗暴地“甩锅”给邻国,向社会灌输一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零和逻辑。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对内部矛盾外部化,将社会不满诱导至对外仇视与对抗的轨道上,为激进的扩军备战骗取所谓“民意支持”。

——利益集团借推动军事扩张渔利。随着日本防卫政策的激进转向,日本防卫费从2012财年到2026财年实现了连续14年上涨,特别是2022年以来3年内翻倍,日本军工企业因此获得大量订单。“国家级操盘”让这些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制造了资本市场上的“军工泡沫”。数据显示,自2022年11月以来,三菱重工股价涨幅超过650%,IHI株式会社股价涨幅超过480%,川崎重工涨幅超过280%。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日本制造业平均年增长率还不到1%。

这些军工企业也十分“识相”,积极向右翼政客提供政治献金。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报告显示,三菱重工自2020年以来每年向自民党资金管理团体捐赠超过3000万日元。右翼政客与军工复合体利益深度绑定,实质上是在透支国家未来,用高额财政赤字为特定财阀集团“输血”。

“我们反对大规模扩充军事力量”,日本绿党成员杉原浩司的疾呼道出了日本社会有识之士的深切担忧,“当政客们高喊‘积极财政’‘振兴经济’口号,却对民众生活困境拿出任何具体对策,其进一步提高防卫预算的做法更是令人无法容忍。”

(下转第十一版)